

粵語不及英語有益？一項關於中國廣東省語言態度的調查

方 興

澳門旅遊學院

提要

本項研究以問卷的方式調查了 102 位來自中國廣東省的粵語母語人士對英語和粵語的態度，以揭示國家的語言政策和人們的語言態度如何對一門地方語言的發展造成影響。它著重分析受訪人群對英語和粵語作為學校授課語言，學校必修課，日常交際語言以及一種資源的看法。研究結果顯示：受訪人群普遍對兩門語言持積極態度，但總體上似乎更偏愛英語，並對粵語的使用有減少的苗頭。這一結果為研究粵語在中國的變化提供了建議。

關鍵詞

語言態度，語言遷移，粵語，英語，廣東省

1. 引言

粵語起源於中國南方，其歷史可以追溯至公元前 221-206 年（Bauer & Benedict 1997）。中國的第一位皇帝嬴政派遣中原地區的人來到百越地區（即現今的廣東省，廣西壯族自治區和海南省）定居，控制居住在南方的部落（Ramsey 1987, Sun 2006）。南下的中原人士逐漸與百越民族通婚，他們的語言與百越地區的語言也逐步融合，形成了粵語的雛形（Bauer & Benedict 1997）。隨著歷史更迭，如今粵語的運用主要集中在廣東省，廣西壯族自治區，以及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人們習慣將廣州地區（現今廣東省省會）的粵語方言視為粵語標準語（Ramsey 1987）。根據人口普查數據，廣東省約有 4000 萬人口使用粵語（廣東年鑒編撰委員會 2018）。

雖然粵語經歷了時代的變遷，但目前在中國的發展似乎面臨來自國家語言政策的影響。這些政策在推廣普通話和普及英語的同時對地方語言的發展支援不足（Chen 1999, Hu 2009, Lam 2005）。Wang 和 Ladegaard（2008）對廣州一所中學的 174 名學生的語言態度和行為進行調查後發現相當數量在廣東出生成長的受訪者認為普通話的推廣帶來機會和競爭優勢，一些受訪者甚至開始在家庭中使用普通話，可見普通話的推廣正改變著廣州的本土語言。單韻鳴和李勝（2018）對廣州人語言態度的研究同樣發現，土生土長的廣州人的母語正在出現代際語言遷移現象，廣州人的母語已不單純是粵語，有的受訪者甚至感歎“在廣州有些地方都可以不講粵語了，說普通話”，“粵語很多地道的說法年輕人都不知道了”。普通話對粵語的影響還引起了一些廣東粵語

人士保護本地語言的行動 (Branigan 2010)。與此同時，英語在中國的迅速發展對粵語造成的影響也值得關注。儘管英語在全球的流行已導致了一些國家的語言發生遷移甚至被取代 (Kamwangamalu 2003, Pakir 1999, Sun 2005)，接受調研的廣東粵語人士普遍對英語持有積極態度，認為英語的工具性價值能夠幫助他們獲得職業晉升和開展國際交流 (Ng & Zhao 2015)，得到更多出國的機會和更高的文化與社會地位 (單韻鳴、李勝 2018)，或是在國際化的商業噱頭下吸引更多顧客。僅有個別受訪者將廣州市內出現的僅含英語的店鋪招牌與西方文化入侵聯繫了起來 (Han & Wu 2019)。這普遍的積極態度可能使缺乏政策支持的地方弱勢語言加速地向優勢語言自願遷移 (voluntary shift) 並衰落 (Baker 2011, Nettle & Romaine 2000)。當英語作為一門國際強勢語言在中國興起，進一步研究廣東省的粵語母語人士對英語和粵語的態度，有助於更好地了解中國目前的語言政策對粵語的影響，並為粵語面臨的發展提供進一步的研究方向。

2. 文獻綜述

2.1. 中國的語言政策

1956年，中國總理周恩來宣布一項行政命令，正式在全國範圍內推廣普通話。該命令表明地區方言對不同方言社群之間的溝通構成障礙，妨礙中國的進一步發展 (Guo 2004)。近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州委員會於2010年7月7日也發布了一份題為《關於進一步加強亞運會軟環境建設的建議案》的文件。該文件的第6部分鑒於在大眾媒體中使用粵語，建議“把廣州電視台綜合頻道或新聞頻道改為以普通話為基本播音用語的節目頻道，或在其綜合頻道和新聞頻道的主時段中用普通話播出，以適應來穗參賽和旅遊的國內外賓客語言環境的需要”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州委員會 2010)。廣州部分的粵語人士認為這一建議約束了粵語的使用，會使其進一步被邊緣化。這一態度後來發展為一些保護本地語言的行動 (Branigan 2010)。2012年3月1日，廣東省人民政府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制定並實施了《廣東省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規定》 (廣東省人民政府 2011)。這項新法規定，普通話和標準漢字應是教育，大眾傳媒和公共服務的基本語言和文字。從這些政策來看，粵語作為方言在中國的發展似乎缺乏足夠和有效的支持。

英語在中國的發展獲得的政策支持與粵語的情況截然不同。隨著鄧小平在1978年實施改革開放政策，英語作為學習現代科學技術的媒介成為中國所有學校的必修科目 (Hu 2004, Lam 2005)。中國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並成功申辦2008年奧運會後，英語作為學校必修學科的地位完全確立 (Lam 2005年)。英語不僅是中國大學本科，碩士及博士課程入學的必考科目，還是獲得良好就業機會的先決條件

(Hu 2003)。以雙語教育為特點的教育國際化在中國興起，英語逐漸成為許多非語言學科的教學用語（趙蓉暉 2014）。由於英語可以轉化為經濟，文化和社會資本（Hu 2009），它已被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視為財富的代名詞（Hu 2004）。此外，英語媒體在中國也獲得發展。政府財政支持新華社，廣州早報等中央和地區層面的英語媒體半自主化運作，滿足公眾對英語學習的熱情（Guo & Huang 2002）。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中國一線城市的規劃者也把外語能力和外語使用程度作為城市國際化評估指標之一。這些外語政策也曾遭到質疑和批評，例如：全民學外語浪費社會資源，外語教育影響民族認同和母語的發展（趙蓉暉 2014），但是外語（尤其是英語）作為連接世界和中國的一架橋梁，目前仍是中國國家整體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並有朝著本土化“中國特色”進一步發展的趨勢（彭龍 2017）。

隨著英語在中國的地位和價值的凸顯，許多廣東人開始傾向在日常粵語對話中摻入一些的英語（王惠、秦秀白 2005: 59）。謝元花（2007）通過調查廣州的這種語碼混用（code-mixing）現象，發現超過半數（55.42%）的受訪者使用粵語時會混合英語單詞或詞組，最常這麼做的是大學生，其次是中小學生和商業工作者。謝元花認為語碼混合是廣東青年人展示其良好教育水平的一種手段。同樣，He（2010）報告說，一些中國的年輕人有意在他們的語言中摻入英語，以“顯示他們時尚和現代”（第8段）。除此以外，按照中國教育部的規定，在廣東的公立學校中，英語是小學三年級及以上的必修科目（教育部 2001，引自 Hu 2004）。中英雙語教育甚至全英教育被視為教育改革和國際化的象徵，在廣東的重點中學和大學開始實施（Yow 2001，廣東工業大學國際教育學院 2019，汕頭大學教務處 2017）。廣泛的英語熱和教育政策對英語的支持促使大量的廣東人學習英語。

2.2. 英語和語言流失（Language loss）

Skutnabb-Kangas（2000）認為擁有眾多使用人士的語言在傳播過程中可能危及其他較弱小的語言。例如：英語作為當今世界的強勢語言在全球的發展已在一些國家造成了語言遷移（language shift）和流失的現象。Fasold（1984）指出，當另一種新語言替代語言群落（speech community）中使用的語言時，語言遷移可能已經發生。南非和新加坡就是這種情況。Kamwangamalu（2003: 70）表示英語已經超過了非洲語言，成為南非的媒體，法院和教育的主要語言，因為“講非洲語言的人認為他們的語言不能養活他們自己”。在世界另一端的新加坡，在20世紀70年代實施了“英語必知雙語政策”（English Knowing Bilingualism）。隨著新加坡人認同英語是傳播現代知識和技術的語言，英語便成為該國首要的官方語言。根據1990年的人口普查，五分之一的加坡人轉而將英語作為主要語言（Pakir 1999）。許多家庭也教導他們的孩子以英語為母語（Gupta 1994）。2006年對新加坡進行的社會語言學調查顯示：英語已成為大多數新加坡兒童最喜歡的語言，該國一半的印度裔和中國裔家庭都講英語（Aman,

Vaish & Bokhorst-Heng 2006)。Zhao 和 Liu (2010) 對新加坡華人地位的考察也發現：華語使用者數量和華語的威望在該國不斷下降，英語的社會和經濟價值使華語在新加坡的家庭裏不斷向英語遷移。同樣，Cavallaro 和 Serwe (2010) 探討了新加坡馬來裔族群的語言遷移情況，發現英語作為促成經濟成功和社會流動 (social mobility) 的語言對馬來社群的年輕人有著強烈的影響。並且他們的結論認為：馬來語正緩慢失去對抗伴隨英語而來的語言遷移的據點之一，例如：家庭。

2.3. 語言態度 (Language attitude)

“態度” (attitude) 一詞原於“才能” (aptitude, 拉丁語) 和“行為, 姿態” (atto, 意大利語)。它最初指“行動的能力”，意味著採取行動的一種傾向 (Baker 1992: 11)。Oppenheim (1982: 39) 對態度的定義也包含了行為特征並反映了該詞語的基本含義。他認為，態度是“心理生活的一個內在組成部分，它直接或間接地通過更為明顯的過程獲得表達，例如：刻板印象、信仰、口頭陳述或反應、意見和觀點、選擇性回憶、憤怒或滿足或其他情緒、以及行為的各個方面”。

Baker (1992) 認為人們的態度可以維持或損害健康，並且它們同樣可以決定一種語言的存亡。Bradley (2002) 和 Gibbons 和 Ramirez (2004) 也指出信念和態度是影響語言維持 (language maintenance) 的一個重要因素。這些看法得到了研究結果的支持。Letsholo (2009) 對博茨瓦納 (Botswana) 說 Ikalanga 語 (一門當地少數民族語言) 的年輕人進行語言態度調查後發現，雖然 Ikalanga 語沒有遭受顯著的流失性的威脅，但由於缺乏國家語言政策的支持和面臨國家主流官方語言賽茨瓦納語和英語的影響，有明顯向賽茨瓦納語逐漸遷移的徵兆。受訪人群多數對更有價值的官方語言持有積極的態度，部份受訪人群還報告稱他們在家庭中更常使用賽茨瓦納語。Sofu (2009) 對三個土耳其雙語家庭 (以土耳其語和阿拉伯語為家庭語言) 中三代人之間語言遷移和維持的個案分析也表明，由於第三代人比前兩代人獲得更好的教育，他們更具備語言保護意識並將自己的傳承語言 (heritage language) 阿拉伯語視為保留文化身份的一種方式。他們對雙語使用持積極的態度，這一態度是阿拉伯語能在這些家庭中得到維持的一個重要因素之一。與 Sofu 的研究結果相反，Bissoonauth (2011) 對居住在毛里求斯 (Mauritius) 的印度裔年輕人群在家庭中使用祖傳印度語言的情況調查後發現，隨著受訪者教育程度的提高，他們對祖傳印度語言的好感下降並逐漸放棄使用這門語言。相反，他們開始偏愛國家的主流語言 (英語和法語)，因為這兩門歐洲語言能幫助他們接觸更廣闊的社群，並帶來學業成就和向上層社會流動的機會。這一語言遷移現象的持續正影響著印度語言在毛里求斯的存亡。Zhang 和 Slaughter-Defoe (2009) 對美國華裔家庭中傳承語言的研究顯示，雖然家長們對傳承語言持有積極態度並視其為資源，民族身份的象徵和家庭和睦的關鍵因素，還積極採取行動在下一代中保留這門語言，但是學校和教師對學生們在維持傳承語言上持有的輕視態度

會導致孩子們消極配合家長們的努力，從而不利於語言的傳承。Duanmu、Zhang、Dong 和 Zhou (2016) 對上海常住人口的語言選擇和使用現狀分析後發現，受訪人群對普通話和英語的使用在增加，對上海話的使用在減少，而且受訪者年齡越小，上海話用的越少，普通話用得越多。這一趨勢與受訪人群的語言態度是一致的：普通話與英語在生活與工作上的重要性高於上海話。單韻鳴和李勝 (2018) 對廣州人的語言態度和粵語傳承的調查也指出，受訪人群對普通話和英語均持正向態度，因為這兩門語言都能帶來個人發展的機會和更多的經濟回報。這一態度改變著廣州人的粵語使用情況，代際語言遷移的現象正在出現。雖然受訪人群對粵語表現出強烈的身份認同，但是他們中超過一半的人對粵語的未來持悲觀態度。

這些調查研究的結果與 Gardner 和 Lambert (1972) 對語言態度的歸納是一致的，即語言習得者的語言態度普遍分為融合性態度和工具性態度。融合性態度的特點是語言習得者渴望成為某個語言群落的代表性成員，並直接或者間接地與這一群落保持聯繫，維持這種身份認同。工具性態度則是語言習得者渴望通過語言獲得社會認可或者經濟優勢。一門語言若能幫助人們維持某種身份認同與文化價值觀或者獲得更多的社會經濟資源，他們對這門語言的態度往往是積極的，相反，他們的語言態度則顯得消極。積極的語言態度顯然助於語言的維護和發展，而消極的語言態度會導致語言使用的逐漸減少甚至消亡。因此，進一步探討粵語人士的語言態度能更好地了解粵語在中國的現狀。鑒於其他國家因英語的社會經濟價值而制定優先發展英語的語言政策和隨之發生的語言遷移，以及中國對粵語方言發展支援不足的同時對英語的社會經濟價值的廣泛認可，本文認同單韻鳴和李勝 (2018) 對粵語在廣東省存在遷移現象的判斷，並希望進一步驗證粵語人士對英語和粵語的態度與語言遷移的聯繫，以增進人們對國際強勢語言如何影響地區方言發展的認識。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本項研究意圖回答兩個具體問題：

1. 在中國廣東省，粵語人士目前對英語和粵語持有什麼態度？
2. 這些人士對他們的語言態度作何解釋？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工具

本項研究採用了研究語言態度的主要方法之一：直接法 (the direct approach) (Garrett, Coupland & Williams 2003)。這種方法要求受訪者回答有關語言現象的問題並直接表達他們的語言態度。這種測量方法通常依賴兩類研究工具：通過口頭交流收集答覆的工具 (例如：訪談) 和引出書面答覆的工具 (例如：問卷) (Henerson,

Morris & Fitz-Gibbon 1987)。本項研究採用了一份含有開放式問題的調查問卷（參見附錄）。問卷的第一部分是關於受訪者的個人背景信息（參見問題# 1至#7），包含年齡、性別、職業、出生地、目前居住地、對家鄉和母語的認同。問卷的第二部分（參見問題# 8至#14）是調查受訪者學習英語的途徑，使用英語的年限和對象，對英語作為學校必修科目和教學語言的看法，以及對英語帶來的益處和英語人士整體印象的看法。問卷的第三部分（參見問題# 15至#20）是調查受訪者使用粵語的對象和方式，對粵語作為學校必修科目和教學語言的看法，以及對掌握粵語的益處和粵語人士整體印象的看法。問卷的第四部分（參見問題# 21）是了解受訪者使用多種語言的綜合情況。為了增強問卷的信度，第一部分的問題設置著重確保受訪者均是出生並居住在廣東省的粵語母語人士，第二至第四部分的問題均以文獻綜述中涉及的關鍵內容為主題，例如：教學語言，必修科目，語碼混用，語言的益處，語言與家庭，語言使用的多寡。問卷中大部分的選擇題都銜接着一個開放式問題，要求受訪者對自己的語言態度進一步作出解釋，這樣的問題設置能幫助拓寬問卷收集信息的深度（Dörnyei 2007）。出於實際的原因，問卷中涉及的語言行為均為受訪者自陳式的行為（self-reported behavior）。Whelpton（1999），Wang 和 Ladegaard（2008）也採用了相似的方法調查語言行為。本文坦承受訪者自陳式的（self-reported）行為可能與實際行為（actual behavior）存在差異。

3.2. 受訪人群

本項研究的調查問卷發放到廣東省的高校學生和在職人士共 132 人。其中 102 人的答覆符合研究的要求，問卷的有效答覆率為 77.27%。受訪者中 66 人（64.71%）為女性，36 人（35.29%）為男性，並且年齡介於 17 歲至 39 歲之間。他們全部在廣東省出生，目前大都居住在省內的 14 個城市，並認為自己的家鄉是廣東省或者省內的城市（參見表 1）。在語言方面，他們均認為粵語是自己的母語，並且都有使用英語的經驗。其中 86.27% 的人使用英語的時間至少是五年，而 13.73% 的人則表示他們使用英語的時間未滿五年。當被問及他們如何學習英語時，超過 98% 的人表示他們通過學校義務教育學到了英語。超過 42% 的人聲稱他們也通過職業培訓班和互聯網學習英語。

表 1 受訪者的出生地，當前居住的城市和自稱的家鄉

城市名稱	出生地		當前居住的城市		自稱的家鄉	
	受訪者 (n)	百分比 (%)	受訪者 (n)	百分比 (%)	受訪者 (n)	百分比 (%)
東莞	16	15.69	19	18.63	10	9.80
佛山	12	11.76	11	10.78	12	11.76
廣州	14	13.73	34	33.33	13	12.75
江門	5	4.90	2	1.96	5	4.90
茂名	3	2.94			4	3.92
清遠	5	4.90			3	2.94
汕頭			20	19.61		
深圳			1	0.98		
陽江	1	0.98			1	0.98
雲浮	3	2.94			5	4.90
湛江	10	9.80	3	2.94	11	10.78
肇慶	13	12.75	7	6.86	10	9.80
中山	2	1.96	2	1.96	2	1.96
珠海			1	0.98		
廣東(省)	18	17.65	2	1.96	26	25.49

註釋：n 指受訪者人數

3.3. 研究步驟

本項研究的受訪者均是本文作者借助在廣東省的職業夥伴關係使用雪球採樣 (snowball sampling) 的方式招募的。作者同時通過電子知情同意書向參與者們解釋了研究的目的，徵得他們同意後方進行問卷調查。為了保護受訪者的隱私，問卷是以匿名的方式作答的。在報告結果時，本文作者亦使用數字代碼區分參與者的回答。

該問卷以標準漢語製作，以防受訪者因英語程度不同或使用粵語的方言變體而對問卷內容產生誤解。隨後，作者邀請了三名與目標問卷人群特徵相似的粵語人士參與問卷測試。測試結束後，作者先對區分觀點不佳的問題進行了調整，然後通過網絡調研工具 Survey Monkey 發放問卷。調查完畢後，作者對定量數據進行了頻率 (frequencies) 分析，並對開放式問題的回答編碼，然後參照 Ryan 和 Bernard (2003) 主題識別技巧進行主題分析 (thematic analysis)。

4. 研究結果

4.1. 受訪者對英語和粵語的態度

總體而言，受訪者的觀點和行為反映了他們對英語的良好態度 (參見表 2 和表 3)：

- 92.15%的受訪者支持英語作為學校的一門必修課；
- 74.51%的受訪者認為英語人士受過更好的教育；
- 63.72%的受訪者支持英語作為學校的授課語言；
- 40.20%的受訪者認為英語人士優越；
- 38.24%及以上的受訪者認為英語能帶來多種益處；
- 31.37%的受訪者認為英語人士文明；
- 26.47%的受訪者認為英語人士禮貌；
- 12.75%的受訪者認為英語人士富裕；
- 13.73%及以上的受訪者與他們時常接觸的人以英語交流，例如：朋友（32.35%）、同學（40.20%）、教師（62.75%）和客戶（20.59%）；
- 5.88%的受訪者甚至與家人一起使用英語，並且
- 兩位受訪者（1.96%）表示他們在生活中使用英語比粵語更頻繁；

此外，71.57%的受訪者稱他們至少有時會將英語詞彙與粵語混合使用。儘管受訪人群對英語表現出積極的態度，但他們中僅有7.84%的人支持將英語作為學校所有科目的授課語言，48.04%的人認為英語作為授課語言應該限於英語語言課堂。

表2和表3將受訪者對粵語和英語的態度也進行了對比。總的看來，許多受訪者對自己的母語也表現出積極的態度。相較英語，粵語仍是他們中大部分人在生活、學校和工作中更頻繁使用的語言。其中91.18%的人表示粵語仍是他們與家人交際時使用的語言，這表明粵語在絕大部分受訪者的家庭中沒有失去地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學校必修課和學校授課語言的看法上粵語得到的支持比英語低得多，各相差43.13%和28.43%。約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認為粵語不應作為一門學校的必修課（27.45%）或用作授課語言（31.37%），而反對將英語作為學校必修科目和學校授課語言的人僅有7.84%和0.98%，各相差19.61%和30.39%。此外，與英語相比，粵語人士與積極的特徵（即文明，禮貌，優越性，教育程度更高和財富）關聯更少，但與負面特徵（即貧窮，落後，野蠻）關聯更多。認為粵語人士具備更高的教育程度和優越性的人數更遠低於認為英語人士具備這兩個特徵的人數，各相差65.69%和17.65%。在語言的益處方面（參見表3），受訪者對英語的認可也明顯多於粵語。粵語僅在交友方面比英語有優勢。通過對比不難看出，受訪人群對粵語的總體態度似乎不如對英語的正面。

表 2 受訪者對粵語和英語的態度比較（一）

語言的使用或者關聯	粵語	英語	差值
	受訪者 百分比 (%)	受訪者 百分比 (%)	H/L 百分比 (%)
學校必修科目	49.02 (F)	92.15 (F)	43.13 (L)
	27.45 (A)	7.84 (A)	19.61 (H)
學校授課語言	35.29 (F)	63.72 (F)	28.43 (L)
	31.37 (A)	0.98 (A)	30.39 (H)
與家人交際	91.18	5.88	85.30 (H)
與鄰居交際	61.76	2.94	58.82 (H)
與朋友交際	95.10	32.35	62.75 (H)
與同學交際	80.39	40.20	40.19 (H)
與教師交際	48.04	62.75	14.71 (L)
與同事交際	55.88	13.73	42.15 (H)
與客戶交際	31.37	20.59	10.78 (H)
與商業夥伴交際	24.51	15.69	8.82 (H)
生活中最常用的語言	81.37	1.96	79.41 (H)
文明	28.43	31.37	2.94 (L)
禮貌	22.55	26.47	3.92 (L)
優越性	22.55	40.20	17.65 (L)
教育程度更高	8.82	74.51	65.69 (L)
財富	7.84	12.75	4.91 (L)
貧窮	1.96	0.98	0.98 (H)
落後	1.96	0.98	0.98 (H)
野蠻	1.96	0.98	0.98 (H)

註釋：F 表示支持；A 表示反對；H 表示高於；L 表示低於

表 3 受訪者對粵語和英語的態度比較（二）

語言帶來的益處	英語	粵語	差值
	受訪者 百分比 (%)	受訪者 百分比 (%)	M/L 百分比 (%)
一份更好的工作	58.82	24.51	34.31 (M)
工作能順利晉升	45.10	20.59	24.51 (M)
更多朋友	49.02	61.76	12.56 (L)
出國工作	39.22	3.92	35.30 (M)
出國學習	38.24	2.94	35.30 (M)
出國旅遊	57.84	3.92	53.92 (M)
對別的語言和文化更包容	60.78	46.08	14.70 (M)
體驗一種不同的生活方式	61.76	32.35	29.41 (M)

註釋：M 表示多於；L 表示少於

4.2. 受訪者對語言態度的解釋

受訪人群提出了兩個主要理由來解釋他們對英語的積極態度。首先，英語能使中國與世界聯繫得愈加緊密，從而帶來更好的發展機會和更大的經濟效益。72.92%的受訪者認為教授英語這門全球語言將使中國與世界密切聯繫。102號受訪者說：“在中國，英語的功能就像一座橋樑，使我們能夠與其他國家的人士交流。”99號受訪者也說：“中國目前正在國際化。英語教育不容忽視。”16.67%的受訪者認為英語具有很高的經濟價值。38號受訪者說：“學習英語後，還有另外一個渠道可以找到工作。”36號受訪者強調道：“學好英語可以讓你賺外國人的錢！”這些言論都直接表明英語使學習者受益，也呼應了Hu（2009）的觀察：英語可以轉化為經濟資本。受訪人群對英語持積極態度的另一個理由是英語成了先進、時尚和現代的代名詞。43號受訪者表示：“西方是文明和先進的，所以英語給我諸如文明和優越感的感覺。”13號受訪者也說：“我印象中說英語的人是彬彬有禮的紳士或者是舉止大方的淑女。”部分受訪者還坦言模仿香港影視傳媒描繪的時尚的用語方式，將粵語和英語混合使用。70號受訪者說道：“香港的電影裏常出現這樣的語言混用，而且我已經學會了。”100號受訪者也說：“受電視的影響，特別是香港那邊的影響，我偶爾會在粵語裏摻一些（英語）。”

另一方面，受訪人群對英語的主要擔憂是過度學習外語可能會阻礙本土語言文化的傳承與發展，還可能降低中國學生的學習質量。98號受訪者說道：“太多科目用英語教學，擔心會影響學生對中文的學習。”101號受訪者指出：“漢語是中國人的核心，所以英語應該在漢語不受影響的條件下發展起來。這是非常必要的！”67號受訪者也認為“中文才是日常使用的語言，這關係到中華文化的傳承。非母語的外語教學，並不是每個學生都能接受。不能因為英語學不好而影響其它文化的學習，甚至讓很多有天賦的孩子失去學習其他文化的機會。”43號受訪者是一名正在使用英語學習商業課程的大學生。他解釋說：“作為商學院的一名學生，其實挺多專業課都是用英語授課的。不得不說，英語授課為專業學習製造了障礙，因為我們的英語水平還達不到那麼高，專業知識也很具挑戰性。用英語教這些知識增加了我們理解的難度。”

受訪人群為他們對粵語的積極態度也作出了兩個主要的解釋。首先，粵語可以保持和強化地方文化與人們的身份認同。1號受訪者說：“粵語聽起來不錯，因為它給了我一種親密的感覺。”69號受訪者也說：“和歸屬感有關。粵語讓我有文化上的親近感。”90號受訪者亦強調：“粵語是廣東的文化，有了它才能承載著廣東！”92號受訪者支持將粵語定為學校的必修課並解釋說：“雖然我是廣東人，但我不知道如何用粵語表達一些話。我認為應該教授粵語，並且通過課程向學生展示這門語言中包含的中國文化。”2號受訪者也感嘆道：“粵語作為一種文化應該被傳承吧。我們是粵語省份。”95號受訪者更呼籲道：“尊重語言和文化！沒有保護，廣東文化可能會消

失。”受訪人群對粵語持積極態度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粵語是一門有聲望的語言。當被問及為何將粵語人士與文明，財富和優越性聯繫起來時，36號受訪者解釋道：“我感到自信，因為很多海外華人都會講粵語。”13號受訪者認為“也許是因為很多人在提到粵語時都會想到香港”。這些說法與 Gao (2012) 的調查結果相一致，即國際上對粵語的認可強化了許多人對其優勢的信念。

相反，受訪人群對粵語持消極態度的一個主要原因在於粵語相對而言是一門缺乏廣泛使用的地區語言。43號受訪者坦言道：“粵語的應用範圍不像英語這麼廣，粵語說白了也就是一種方言。學校沒必要把一種方言作為必修課。但作為選修課，我則是贊同的。”101號受訪者同樣認為“它（粵語）沒有一種在全國或者全世界的競爭性及優勢，專為學它沒必要。廣東人天生就會講粵語，沒必要精通。學精通了也沒有用處，因為當你走出廣東或中國時，粵語是毫無用處的，或者用處不大。這是浪費學生的時間。”66號受訪者說道：“如果這樣做（將粵語作為學校授課的語言），可能廣東的大多數人不會說一門（全國的）通用語言，他們也不能與其他省份的人交流。”65號受訪者也指出：“廣東的學校還有很多外省小朋友。只使用粵語授課不太好也不公平。”39號受訪者同樣質疑道：“這種教育形式（將粵語作為學校授課的語言）並不具有包容性。你不想跟廣東以外的人說話嗎？”

5. 研究結果的總結與討論

本項研究是由研究問題主導的。鑒於英語在中國的迅速發展以及粵語缺乏足夠的政策支持，本文作者假設粵語在廣東省存在向英語遷移的情況。研究的結果似乎並不完全符合這一假設，但是卻作出了部分論證。總體而言，受訪人群對英語持有比較積極的態度，因為英語能帶來諸多益處，這與其他的研究結果（Duanmu, Zhang, Dong & Zhou 2016, Ng & Zhao 2015, 單韻鳴、李勝 2018）一致。這種態度在受訪人群的語言行為上有幾種具體的表現形式：個別受訪者（5.88%）開始在家庭中使用英語；許多受訪者將英語作為一門日常用語，個別受訪者（1.96%）在生活中使用英語甚至比粵語更頻繁；超過七成（71.57%）的受訪者偶爾會將英語詞彙與粵語混合使用。其中，最值得重視的是家庭語言的改變，因為這是重度語言遷移的主要特徵，詳見 Bissoonauth (2011), (Cavallaro & Serwe 2010), (Letsholo 2009), (Zhao & Liu 2010)。其次值得注意的是受訪人群對英語的使用在增加，對粵語的使用則有減少的苗頭。許多受訪者不但在生活、工作和學習領域頻繁地使用英語，而且通過語碼混用的方式用英語替代粵語詞彙的使用。這些發現也呼應了其他的研究結果，例如：(Duanmu, Zhang, Dong & Zhou 2016), (王惠、秦秀白 2005) 和 (謝元花 2007)。儘管本項研究反映這些語言變化的一些數據顯得微小而缺乏顯著意義，但它們可能代表了語言遷移的前兆，表明潛在的趨勢正在到來。

本項研究的受訪人群對語言態度的解釋也傳達了幾項重要信息。首先，語言的發展與其本身的價值緊密相連。英語的廣泛傳播離不開英國曾經奉行的殖民主義。隨著英國在全球範圍內建立殖民地，英語順利進入了許多國家並成為該國的主流語言。在過往的三個世紀裏，英國和美國相繼通過工業資本主義變成世界領先的經濟大國。先進技術和科學發明在這兩個國家如雨後春筍般湧現，這進一步推動了英語的傳播。渴望學習這些新興科技的人需要學習英語才能理解前沿的科技術語並與來自英美的發明家和製造商們交流（Crystal 1997）。如今，英語已成為獲得科技信息，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發展國際貿易和參與國際流行文化的主流語言，擁有非常牢固的世界性地位（McKay 2002）。英語本身極高的使用價值決定了它將繼續作為中國國家整體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彭龍 2017）。反觀粵語，它並未經歷英語式的殖民性和科技性推廣。雖然從中國移民海外的粵語人士不在少數，但是粵語並未因此成為移民國家的主流和官方語言，也未獲得進一步發展而形成全球範圍內的主導地位並具備國際性的廣泛用途。作為一門漢語方言，粵語的使用仍主要集中在中國的粵港澳地區。隨著中國內地的經濟文化迅速崛起和港式粵語文化對珠三角的影響今非昔比，粵語的活力也在逐漸下降（陳永傑 2015，Wang & Ladegaard 2008）。相較之下，可見當粵語面臨外來強勢語言的競爭時，粵語人群必須努力發掘、提高、強化和宣傳粵語本身的價值，才可能使粵語逐漸影響中國語言政策的走向。當粵語像英語那樣具備更高的經濟和文化價值，人們才容易形成對它的工具性態度（Gardner & Lambert 1972），粵語的維持和推廣才更有保障。否則，缺乏政策支持的弱勢語言與強勢語言的接觸時便會發生消減性雙語現象（subtractive bilingualism）和語言遷移（Garcia 2009）。

其次，母語對維護地方文化和維繫身份認同十分重要。Fishman（1994）指出，語言和文化的整體性至少反映在一個事實上：承載一種文化的語言能夠最準確地描述該文化所特有的事物和觀點。這種文化通過該語言能獲得充分的表達。研究語言和傳統生態知識（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的學者也認為，語言是本土文化存在的實體（Nettle & Romaine 2000, Skutnabb-Kangas, Maffi & Harmon 2003）。由於語言和文化密不可分，本項研究的受訪者將粵語與親近感（一種文化融合感或歸屬感）聯繫起來是合理的。文化是身份認同的獨特標誌（Nettle & Romaine 2000），所以，這份文化融合感也可視作身份認同。Liebkind（1999: 144）認為，人們總體上對母語有“融合性態度（integrative attitude）– 他們對該語言的使用者有認同感，並希望保持這種身份認同”。當一種語言得不到充分的保護而衰亡，與之相連的文化也會隨之消失，言語群落的“群落意識或歸屬感將受到損害”（Kipuri 2009: 58），他們彼此間的身份認同也會逐漸消失。本項研究的受訪人群已意識到粵語對地方文化和身份認同的重要性，這與單韻鳴和李勝（2018）調查的受訪人群對粵語表現出的強烈認同感相似。這種身份認同時也離不開語言本身的價值。只有當粵語本身具備優勢，粵語人群才容易對自己的母語更為自信並自覺地維護粵語群落的身份認同，從而有利於粵語的保護和發展。

再次，母語的使用更有利於教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1953: 11）倡導母語教育並提出：“教育孩子的最佳媒介毫無疑問是他的母語。在心理上，母語是孩子腦海中一個有意義的符號系統，能幫助他們自動地進行表達和理解。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母語是孩子所屬社群成員之間識別彼此的一種手段。在教育層面，與陌生的語言媒介相比，母語能使孩子學習變得更加迅速。” Rollnick 和 Rutherford（1996: 101）在研究使用母語學習科學概念時，發現母語可以更好地為學習服務，因為它有助於“澄清概念，消除誤解和表述想法”。Benson（2002: 303）對發展中國家雙語教學項目的調研也表明，在小學教育中使用母語有諸多益處，例如：“彌合家庭和學校之間的文化差距，提高學生的身份意識和自尊”。此外，Li 和 Majhanovich（2010）對後殖民時期香港母語教育政策效力的研究也證明了母語教育的重要性。他們發現母語對學生學習語言要求較高的科目尤為重要。鑒於母語對學習與認知發展的益處，政府和學校在推行中英雙語教育甚至全英教育時的確需要仔細考量外語（英語）教學該如何“在漢語不受影響的條件下發展起來”（101號受訪者）以及如何為外語能力較弱但母語能力正常的學生提供公平接受教育的機會。值得參考的措施包括：加拿大提倡的語言多元化政策，例如：在正規教育中設立文化傳承母語課程（Fishman 1991）；香港在中小學推行的“兩文三語”的語文教育政策，注重培養學生操流利的粵語、普通話和英語的能力（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 2011）；臺灣探討的具有“反省本土文化與語言機制”的外語政策，做到既能培養具跨文化知識和國際公民素養的人才又能保護本土語言的核心價值（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2011）。

6. 局限性

雖然本項研究經過一番考量后才開展，但仍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本項研究涉及的語言行為均是受訪人群的自陳式的行為，他們實際的語言行為可能存在差異。本文認同 Wang 和 Ladegaard（2008）的看法，對粵語人群實際的語言使用展開觀察調研結果會更理想。其次，對於受訪人群，本文因疏忽而未在調查時明確區分他們是在廣東地區長期土生土長的人士，還是新來的外省移民。儘管受訪者都聲稱自己在廣東出生和居住，但是外來移民在廣東出生的子女對粵語的態度可能還是有別於常年土生土長的廣東人。因此，未來的研究可以關注這項語言態度的對比。再次，本文在闡釋調查結果時沒有詳細考量年齡，性別，職業等人口統計變量。未來進行一項多變量的分析討論可能會產生更為深入的研究結果。最後，本項調查的樣本量似乎不夠大。因此，研究的結果可能不能概括為代表廣東全省或中國廣大粵語人士的語言行為和態度。

7. 結語

粵語是中國廣東省傳統的主流語言，但是其目前在中國的發展缺乏堅實的政策支持並面臨國際強勢語言英語的競爭。作為當今全球通用語言，英語有助於世界各國科

技發展、經濟交流、文化互動和開展外交，顯然十分重要。但是，它的快速發展和推廣也造成了一些地方弱勢語言的改變、遷移甚至消失。以往的研究證明語言的流失往往與人們對語言的態度有關。因此，本項調查試圖分析一小部分廣東省粵語母語人士對英語和粵語的態度，以了解這些態度對粵語現狀可能存在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受訪人群對兩門語言的態度都比較積極，但總體上似乎更偏愛英語。這種態度也體現為受訪人群語言行為的改變：個別受訪者開始在家庭內使用英語，許多受訪者對粵語的使用有減少的苗頭，雙語混用現象比較普遍。這些結果雖然無法表示粵語在廣東省內正大範圍地向英語遷移，但卻與其他研究報告的結果近似：粵語在中國的活力有下降的趨勢。因此，未來有必要進行更大樣本量的縱向研究（longitudinal studies），更深入地剖析廣東省的語言遷移問題以及促使這種變化發生的原因。

基於受訪人群對自我語言態度的解釋，本文認為逆轉粵語這種變化趨勢的關鍵在於發掘和增強粵語本身的價值。粵語人群和關注粵語發展的人士需要思考如何才能重現並擴大粵語曾經的社會影響力，是否可以利用粵語的傳統內涵開發更多新穎的文化項目，並能創造巨大的經濟與文化價值。只有語言本身的價值得到彰顯，人們對它的態度才可能變得更積極，也更願意使用和保護它，同時對這門語言所象徵的群落身份更自信與認同。做到了這點，粵語就可能影響國家語言政策的走向，從而得到更切實的保護與發展。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現實問題是廣東省能否強化多語種語言政策（multilingual language policy），更多地將不同的語言視作資源加以整合與利用，而不是把它們視為可能阻擋國家經濟發展和人民溝通交流的問題與障礙（Garcia 2009）。多元的語言政策有利於廣東人民利用母語參與公共教育，掌握更多的語言工具和形成多元的文化身份。在省域內，拓寬粵語的發展空間有利於文化語言上同宗同源的香港和澳門與珠三角更好地融合。在中國和世界範圍內，掌握好普通話與英語也能培養良好的國民與世界公民意識及跨文化交際能力。

本文相信對以上這些問題的進一步探討和研究既會為粵語等方言在中國的發展鋪平道路，又會為擁有豐富語言文化資源的中國帶來更精彩的发展。

附錄：中國廣東省粵語人士對英語和粵語的態度問卷調查

第一部分（個人背景信息）

- 1) 您的年齡： 17-22 歲 23-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 歲及以上
- 2) 您的性別： 男性 女性

3) 您的職業： 初中生 大學生 其他，請指出：_____

4) 您的出生地：_____

5) 您認為您的家鄉是哪裏？_____

6) 您認為您的母語是什麼語言？_____

7) 您目前所居住的城市是：_____

第二部分（對英語的使用和看法）

8) 您說英語的年限是：

5 年以下

5 至 10 年之間

11 至 15 年之間

16 至 20 年之間

20 年以上

9) 請問您是如何學習英語的？（可多選）

學校義務教育

家人之間（語言）互動

私人家教

私人語言培訓中心

職業培訓班

大眾媒體（如：電視，電影）

網絡

以上都不是

其他（請具體指明）：_____

10) 請問您通常與誰用英語對話？（可多選）

朋友

家人

同學

同事

老師

客戶

商業夥伴

鄰居

以上都不是

其他（請具體指明）：_____

11) 請問您會把說英語的人與以下哪些詞聯系起來：（可多選）

文明

貧窮

教育程度更高

落後

財富

優越（性）

野蠻

禮貌



以上都不是

其他（請具體指明）：_____

您為何會如此認為：_____

12) 請問英語作為學校的一門必修課對中國學生的學習有多重要？

沒必要 意義很小 一般重要 重要 十分重要

您為何會如此認為：_____

13) 請問您對英語作為學校的授課語言的態度是？

學校裏所有的科目都應該用英語教授。

至少自然科學類的科目應該用英語教授。

我不在乎，只要學生能學到有用的知識就可以了。

只適合英語（語言）課，這樣學生的中文學習就不會受影響。

中國的學生應該用中文接受任何科目的教育。

請解釋您的選擇：_____

14) 請問英語給您帶來了什麼？（可多選）

一份更好的工作 工作能更順利地晉升 更多朋友

出國工作 出國留學 出國旅遊

對別的語言和文化更包容 體驗壹種不同的生活方式

以上都不是

其他（請具體指明）：_____

進一步的評價：_____

第三部分（對粵語的使用和看法）

15) 請問您通常與誰用粵語對話？（可多選）

朋友 家人 同學 同事

老師 客戶 商業夥伴 鄰居

以上都不是

其他（請具體指明）：_____

16) 請問您會把說粵語的人與以下哪些詞聯繫起來：（可多選）

文明 貧窮 教育程度更高 落後

財富 優越（性） 野蠻 禮貌

以上都不是

其他（請具體指明）：_____

您為何會如此認為：_____

17) 請問您認為粵語應當被定為廣東學校教學的主要授課語言嗎？

十分不贊同 不贊同 不確定 贊同 十分贊同

請解釋您的選擇：_____

18) 請問您認為粵語應當作為壹門正式的必修課在廣東的學校進行教授嗎？

十分不贊同 不贊同 不確定 贊同 十分贊同

請解釋您的選擇：_____

19) 請問粵語給您帶來了什麼？（可多選）

一份更好的工作 工作能更順利地晉升 更多朋友 出國工作 出國留學

出國旅遊 對別的語言和文化更包容 體驗壹種不同的生活方式

以上都不是

其他（請具體指明）：_____

進一步的評價：_____

20) 請問您會在粵語裏參摻英語詞彙嗎？

從來都不 很少 有時 常常 總是

請解釋您的選擇：_____



第四部分（多語使用的綜合情況）

21) 請問總的說來，您在生活中使用以下哪種語言的頻率最高？

普通話 英語 粵語

請解釋您的選擇： _____

鳴謝

本文作者衷心感謝加拿大約克大學教育學院的 Heather Lotherington 博士對本手稿早期版本的批評與指導。作者同時還要感謝兩位匿名評審的細心審閱與寶貴意見，使本文日臻完善。

參考文獻

- Aman, Norhaida, Viniti Vaish & Wendy Bokhorst-Heng. 2006. *The sociolinguistic survey of Singapore 2006*. Singapor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Centre for Research in Pedagogy and Practice.
- Baker, Colin. 1992. *Attitudes and language*.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Baker, Colin. 2011. *Foundations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5th edn.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Bauer, Robert S. & Paul K. Benedict. 1997. *Modern Cantonese phonology*.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Benson, Carolyn J. 2002. Real and potential benefits of bilingual programm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5(6). 303–317.
- Bissoonauth, Anu. 2011. Language shift and maintenance in multilingual Mauritius: The case of Indian ancestral languages.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32(5). 421–434.
- Bradley, David. 2002. Language attitudes: The key factor in language maintenance. In David Bradley & Maya Bradley (eds.), *Language endangerment and language maintenance*, 1–10. London: RoutledgeCurzon.
- Branigan, Tania. 2010. Protesters gather in Guangzhou to protect Cantonese language.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10/jul/25/protesters-guangzhou-protect-cantonese> (accessed 12 February 2017).
- Cavallaro, Francesco & Stefan Kari Serwe. 2010. Language use and language shift among the Malays in Singapore. *Applied Linguistics Review* 1(1). 129–170.
- Chen, Ping. 1999. *Modern spoken Chinese: History and sociolinguistics*.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en, Yongjie (陳永傑). 2015. Yuwen zhengce yu shenfen rentong: Gaigekaifang yilai de guangfu wenhua yu guangfuren 語文政策與身份認同：改革開放以來的廣府文化與廣府人 *Sixiang Xiangang* 思想香港 6. 47–62.
- Crystal, David. 1997.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örnyei, Zoltan. 2007. *Research method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Quantitative, qualitative, and mixed methodolog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uanmu, San, Yingyue Zhang, Yan Dong & Yiwen Zhou. 2016. A study of language choices and language use by residents of Shanghai. *Global Chinese* 2(2). 241–258.
- Fasold, Ralph. 1984.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 Fishman, Joshua. 1991.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Bistol, England: Multilingual Matters.
- Fishman, Joshua. 1994. The truth about language and culture (and a note about its relevance to the Jewish ca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109. 83–96.
- Gao, Xuesong. 2012. “Cantonese is not a dialect”: Chinese netizens’ defense of Cantonese as a regional lingua franca.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33(5). 449–464.
- Garcia, Ofelia. 2009. *Bilingual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A global perspective*. Chichester, UK: Wiley-Blackwell.
- Gardner, Robert C. & Wallace E. Lambert. 1972. *Attitudes and motivation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Rowley, MA: Newbury House.
- Garrett, Peter, Nikolas Coupland & Angie Williams. 2003. *Investigating language attitudes: Social meanings of dialect, ethnicity, and performance*. Cardiff, UK: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 Gibbons, John & Elizabeth Ramirez. 2004. Different beliefs: Beliefs and the maintenance of a minority language.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23(1). 99–117.
- Guangdong Gongye Daxue Guoji Jiaoyu Xueyuan (廣東工業大學國際教育學院). 2019. Quanying, shuangyu jiaoyu moshi 全英、雙語教育模式 <http://sie.gdut.edu.cn/info/1162/2676.htm> (accessed 23 July 2019).
- Guangdong Nianjian Bianzhuan Weiyuanhui (廣東年鑒編撰委員會). 2018. *Guangdong Nianjian 2018 廣東年鑒 2018* Guangzhou: Guangdong Nianjian She 廣州：廣東年鑒社 <http://www.gd.gov.cn/wz/fj/%E5%B9%BF%E4%B8%9C%E5%B9%B4%E9%89%B42018.pdf> (accessed 16 July 2019).
- Guangdongsheng Renmin Zhengfu (廣東省人民政府). 2011. Guangdongsheng guojia tongyong yuyanwenzi guiding 廣東省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規定 http://zwgk.gd.gov.cn/006939748/201112/t20111216_297089.html (accessed 20 February 2017).
- Guo, Longsheng. 200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tonghua and Chinese dialects. In Minglang Zhou & Hongkai Sun (eds.), *Language Polic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ory and Practice Since 1949*, 45–54.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Guo, Zhongshi & Yu Huang. 2002. Hybridised discourse: Social openness and functions of English media in post-Mao China. *World Englishes* 21(2). 217–230.
- Gupta, Anthea Fraser. 1994. *The step-tongue: Children’s English in Singapore*.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Han, Yanmei & Xiaodan Wu. 2019. Language policy, linguistic landscape and residents’ perception in Guangzhou, China: Dissents and conflicts.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4664208.2019.1582943> (accessed 15 July 2019).
- He, Na. 2010. Rush to learn English fuels quality issues. http://usa.chinadaily.com.cn/2010-08/05/content_11103536.htm (accessed 10 March 2017).
- Henerson, Marlene E., Lynn Lyons Morris & Carol Taylor Fitz-Gibbon. 1987. *How to measure attitudes*, 2nd edn. Newbury Park: Sage.



- Hu, Guangwei. 2003.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in China: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contributing factors.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24(4). 290–318.
- Hu, Guangwei. 2004.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in China: Policies, progress, and problems. *Language Policy* 4. 5–24.
- Hu, Guangwei. 2009. The craze for English-medium education in China: Driving forces and looming consequences. *English Today* 25(4). 47–54.
- Jiaoyubu (教育部). 2001. *Jiaoyubu Guanyu Jiji Tuijin Xiaoxue Kaishe Yingyu Kecheng de Zhidao Yijian* 教育部關於積極推進小學開設英語課程的指導意見 Beijing: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Jiaoyubu 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
- Kamwangamalu, Nkonko M. 2003. Globalisation of English, and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shift in South Afric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Language* 164. 65–81.
- Kipuri, Naomi. 2009. Culture. In United Nations, *State of the world's indigenous peoples*, 52–81.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http://www.un.org/esa/socdev/unpfii/documents/SOWIP/en/SOWIP_web.pdf (accessed 25 May 2017).
- Lam, Agnes. 2005. *Language education in China: Policy and experience from 1949*.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Letsholo, Rose. 2009. Language maintenance or shift? Attitudes of Bakalanga youth towards their mother tongu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12(5). 581–595.
- Li, Vickie W. K. & Suzanne E. Majhanovich. 2010. Marching on a long road: A review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other-tongue education policy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GIST-Education and Learning Research Journal* 4. 10–29.
- Liebkind, Karmela. 1999. Social psychology. In Joshua Fishman (ed.),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ethnic identity*, 140–15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cKay, Sandra Lee. 2002. *Teaching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Rethinking goals and approach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ettle, Daniel, and Suzanne Romaine. 2000. *Vanishing voices: The extinction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g, Dana Funywe & Juanjuan Zhao. 2015. Investigating Cantonese speakers' language attitudes in mainland China.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36(4). 357–371.
- Oppenheim, Bram. 1982. An exercise in attitude measurement. In Glynis M. Breakwell, Hugh C. Foot & Robin Gilmour (eds.), *Social psychology: A practical manual*, 38–56. London: Macmillan.
- Pakir, Anne. 1999. Bilingual education with English as an official language: Sociocultural implications. In James E. Alatis & Ai-Hui Tan (eds.), *Georgetown University round table o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341–349.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 Peng, Long (彭龍). 2017. Zhongguo waiyu jiaoyu fazhan de zhongyao qushi 中國外語教育發展的重要趨勢 *Zhongguo Gaodeng Jiaoyu* 中國高等教育 7. 16–19.
- Ramsey, S. Robert. 1987. *The languages of China*.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ollnick, Marissa & Margaret Rutherford. 1996. The use of mother tongue and English in the learning and expression of science concepts: A classroom-based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18(1). 91–103.

- Ryan, Gery W. & H. Russell Bernard. 2003. Techniques to identify themes. *Field Methods* 15(1). 85–109.
- Shan, Yunming (單韻鳴) & Sheng Li (李勝). 2018. Guangzhouren yuyan taidu yu Yueyu rentong chuancheng 廣州人語言態度與粵語認同傳承 *Yuyan Zhanlue Yanjiu* 語言戰略研究 3(3). 42–50.
- Shantou Daxue Jiaowuchu (汕頭大學教務處). 2017. Shantou Daxue benke shuangyu/quanYing kecheng guanli banfa 汕頭大學本科雙語 / 全英課程管理辦法 https://jwc.stu.edu.cn/Detail.aspx?Content_ID=353 (accessed 23 July 2019).
- Skutnabb-Kangas, Tove. 2000. *Linguistic genocide in education - or worldwide diversity and human rights?*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 Skutnabb-Kangas, Tove, Luisa Maffi & David Harmon. 2003. *Sharing a world of difference: The earth's linguistic, cultural, and biological diversity*.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UNESCO, Terralingua and 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3/001323/132384e.pdf> (accessed 7 May 2017).
- Sofu, Hatice. 2009. Language shift or maintenance within three generations: Examples from three Turkish-Arabic-speaking famil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 6(3). 246–257.
- Sun, Chaofen. 2006. *Chinese: 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un, Hongkai. 2005. The Anong language: Studies of a language in declin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173. 143–157.
- UNESCO. 1953. *The use of vernacular languages in education*. Paris: UNESCO.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00/000028/002897EB.pdf> (accessed 27 May 2017).
- Wang, Hui (王惠) & Xiubai Qin (秦秀白). 2005. Yueyu zhong de Yingyu yici weitan 粵語中的英語譯詞微探 *Huanan Ligong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華南理工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7(3). 58–61.
- Wang, Limei & Hans J. Ladegaard. 2008. Language attitudes and gender in China: Perceptions and reported use of Putonghua and Cantonese in the Southern province of Guangdong. *Language Awareness* 17(1). 57–77.
- Whelpton, John. 1999. Cantonese, English and Putonghua in a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 Language use and language attitudes. *Hong Kong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4(2). 79–92.
- Xianggang Tebie Xingzhengqu Zhengfu Jiaoyuju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 2011. Jiaoxue yuyan 教學語言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secondary/moi/guidance-index.html> (accessed 4 August 2019).
- Xie, Yuanhua (謝元花). 2007. Guangzhou Hanyu yu Yingyu de yuma hunhe 廣州漢語與英語的語碼混合 *Hubei Shifan Xueyuan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湖北師範學院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27(3). 129–133.
- Xingzhengyuan Yanjiu Fazhan Kaohe Weiyuanhui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2011. “Woguo waiyu zhengce zhi jiantao yu zhanwang” zhengce jianyishu “我國外語政策之檢討與展望” 政策建議書 https://ws.ndc.gov.tw/001/administrator/10/refile/5644/3286/0058968_1.pdf (accessed 4 August 2019).
- Yow, Sophia. 2001. Guangdong to trial English as medium. <http://www.scmp.com/article/360821/guangdong-trial-english-medium> (accessed 6 March 2017).



- Zhang, Donghui & Diana T. Slaughter-Defoe. 2009. Language attitudes and heritage language maintenance among Chinese immigrant families in the USA. *Language, Culture and Curriculum* 22(2). 77–93.
- Zhao, Ronghui (趙蓉暉). 2014. Zhongguo waiyu guihua yu waiyu zhengce de jiben wenti 中國外語規劃與外語政策的基本問題 *Yunnan Shifan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雲南師範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46(1). 1–7.
- Zhao, Shouhui & Yongbing Liu. 2010. Home language shif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language planning in Singap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estige planning. *The Asia-Pacific Education Researcher* 16(2). 111–126.
- Zhongguo Renmin Zhengzhi Xieshang Huiyi Guangzhoushi Weiyuanhui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州市委員會). 2010. Guanyu jinyibu jiaqiang Yayunhui ruanhuanjing jianshe de jianyi'an 關於進一步加強亞運會軟環境建設的建議案 https://www.gzzx.gov.cn/jyxc/cwhyjya/201007/t20100707_49724.htm (accessed 17 February 2017).

Is Cantonese Less Useful Than English? An Investigation of Language Attitudes in the Guangdong Province of China

Xing Fang

Macao Institute for Tourism Studies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detailed study of 102 Cantonese speakers' attitudes towards English and Cantonese in the Guangdong province of Southern China. The study explored the opinions of language use held by the sampled population to reveal how a country's language policy and its people's language attitudes can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a regional language. It examined the results of a survey in search of the respondents' general beliefs about English and Cantonese in terms of language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language as a compulsory school subject, language in daily use, and language as a resource. The findings showed that the respondents generally held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s the two languages but seemed to favor English more and tended to reduce their use of Cantonese. The study ended by suggesting further research towards more profound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antonese in changing China.

Keywords

language attitude, language shift, Cantonese, English, Guangdong province

通訊地址：澳門 望廈山 澳門旅遊學院 酒店管理學校及旅遊管理學校

電郵地址：xfang@ift.edu.mo, xfang210@aliyun.com

收稿日期：2019年4月30日

接受日期：2019年8月21日